



中国前进的航标

——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解读

任大立 主编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前进的航标

——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解读

任大立 主编

长江出版传媒
© 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前进的航标: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解读/任大立主编。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2.1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7436 - 0

- I. 中…
- II. 任…
- III.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—史料
- IV. D2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8061 号

中国前进的航标
——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解读

任大立 主编

出版发行:  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数:385 千字
版次: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7436 - 0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19.75
插页:3
印次: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38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目 录

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/ 1

- 一、陈独秀、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/ 1
- 二、英气勃勃的中共一大代表 / 4
- 三、在秘密状态下紧张召开的中共一大 / 8
- 四、制定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 / 14
- 五、妙手著文章的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/ 19

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5

- 一、中共二大的召开 / 25
- 二、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/ 29
- 三、中共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 / 32
- 四、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/ 38

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/ 44

- 一、中共三大的召开 / 44
- 二、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 / 48
- 三、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》 / 53
- 四、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/ 54

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/ 57

- 一、中共四大的召开 / 57
- 二、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问题 / 62
- 三、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》 / 65
- 四、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/ 66

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/ 68

- 一、中共五大的召开 / 68
- 二、没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共五大纲领 / 73
- 三、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》 / 81
- 四、陈独秀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/ 82

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/ 87

- 一、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召开 / 87
- 二、中共六大的主要历史功绩及局限 / 94
- 三、在六大上唱主角的瞿秋白被向忠发取而代之 / 98

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/ 109

- 一、一再延期的中共七大 / 109
- 二、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 / 116
- 三、制定了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党章 / 120
- 四、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领导集体 / 123

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/ 135

- 一、姗姗来迟的中共八大 / 135
- 二、制定了正确的八大路线 / 141
- 三、产生了中共执政条件下的第一部党章 / 145
- 四、毛泽东连任主席 邓小平当选总书记 / 151

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/ 156

- 一、中共九大召开前的复杂形势 / 156
- 二、中共九大的独特开法 / 163
- 三、充满极左观点的九大政治报告 / 169
- 四、规定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九大党章 / 173
- 五、毛泽东三任主席 林彪是唯一的副主席 / 175

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/ 181

- 一、中共十大召开的背景 / 181

二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报告 / 186
三、提出要敢于反潮流的中共十大党章 / 191
四、毛泽东四任主席 王洪文破格当副主席 / 194
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02
一、中共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/ 202
二、以“抓纲治国”和“两个凡是”为灵魂的政治报告 / 210
三、中共十一大党章的局限与进步 / 216
四、华国锋当选为主席 邓小平重新任副主席 / 218
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23
一、中共十二大召开的背景和过程 / 223
二、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政治报告 / 225
三、实现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十二大党章 / 230
四、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/ 233
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40
一、中共十三大召开的背景和过程 / 240
二、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十三大报告 / 243
三、明确规定实行差额选举的十三大党章 / 251
四、向年轻化、专业化迈进的中央领导集体 / 252
第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55
一、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召开 / 255
二、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四大报告 / 257
三、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四大党章 / 261
四、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/ 264
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67
一、十五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/ 267
二、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五大党章 / 274
三、江泽民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/ 275

第十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78

- 一、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六大报告 / 278
- 二、把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十六大党章 / 285
- 三、胡锦涛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/ 290

第十七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/ 295

- 一、突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十七大报告 / 295
- 二、强调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十七大党章 / 303
- 三、胡锦涛连任总书记 习近平、李克强等当选中央常委 / 306

后 记 / 310

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

中共一大档案

开会时间：1921年7月23日开幕

开会地点：上海法租界、浙江嘉兴南湖

与会代表：中国代表 13 人、共产国际代表 2 人

全党党员：50 多人

历史地位:创建了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

一、陈独秀、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

1921年7月23日晚8时许，夜幕降临，华灯初放。

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的一楼厨房里，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餐桌，餐桌边，围坐着一群穿戴各异的客人。但餐桌上，并没有食品，只有茶具和烟灰缸。这些来客并不是来共进晚餐，而是要借这个地方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。

会议的开法很特别：

不是在正规的会场开会,而是在私人住宅开会,并且是在厨房,厨房约 18 平方米大。

开会时正值盛夏，天气炎热，房间也没有空调，却大门紧闭，使房间更显闷热。说是开会，但会场没有张贴任何会议标识，只是比平时多加了几把椅子。虽不是国际性质的会议，但出席会议的人中，除了中国人外，还有来自欧洲的与会者，并在会议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所以会场还要有英语翻译。

与会者的性别单一，都是男性，但年龄迥异，有的是正在读书的19岁青年，有的却已是三个孩子的45岁的中年人。

会议特别重要，但在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公开的新闻媒体没有这次会议的

任何报道，更没有马上在社会上引起什么立竿见影的震动。但这次会议后，一个幽灵——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上空徘徊，最终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

这个神秘而特别的会议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简称中共一大。

会议之所以显得神秘、特别，是为了保密和安全。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，正是北洋军阀当政。当时的中国，在报刊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作一般的介绍都有许多限制，如果倡导马克思主义，建立共产党，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、洪水猛兽，当政者是严令禁止的。所以会议必须悄悄召开。

围坐在餐桌边开会的共有 15 人。他们是：

上海党组织代表：李达、李汉俊。

北京党组织代表：张国焘、刘仁静。

武汉党组织代表：董必武、陈潭秋。

长沙党组织代表：毛泽东、何叔衡。

济南党组织代表：王尽美、邓恩铭。

广州党组织代表：陈公博。

旅日留学生党组织代表：周佛海。

陈独秀指定代表：包惠僧。

共产国际代表：马林、尼克尔斯基。

细看上述中共一大代表名单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在与会的 15 名代表中，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名字。这两人当时号称“南陈北李，两颗星辰”，既是当时的文化泰斗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的主要领导人。他们理应是中共一大代表，却都没有出席会议，为什么？

是因为他们没接到开会通知？不是。中共一大的会议筹备工作，他们两人都参与了。

是因为两人的名气大，到上海开会不安全？不是。他们两人都是勇敢的民主斗士，从来不惧怕什么。陈独秀是终生的反对派，一生先后五次坐过牢。李大钊 1927 年在走上绞刑架前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。

陈独秀、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，直接原因是公务繁忙难以抽身。

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党的早期组织——上海党组织的主要创立者。一大召开前夕，他虽然不在上海，但仍然是上海党组织的书记，而上海党组织，当时被其他地方党组织看成是“临时中央”，中共一大前陈独秀在党内的角色，相当于临时中央的书记。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，也都是在与陈独秀协商后才决定下来的。但陈独秀这个中共一大的当然代表，却在接到到上海开会的通知后，没到上海参加一大，继续在广州当他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。

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的直接原因，是他当时正在筹建大学校舍离不开。当时，

陈独秀除了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外，还兼任了一所大学预科的校长，正在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去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。他认为一走，这笔款子就不好办了。

李大钊是在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，也是党在初创时期的主要领袖。最早的共产国际代表到华时，开始也是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联系，李大钊再推荐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。北京党组织成立后，他是负责人。一大筹备工作，也是在与他保持沟通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
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，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太忙，抽不开身。当时他除了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外，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、教授评议会评议员，召开一大时虽然学生放假了，但正值大学学年结束，作为著名教授和管理者事务特别多。另外，李大钊当时还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，由于北洋政府拖欠教师薪水现象严重，李大钊要留京全力领导已持续了几个月的索薪斗争，与北洋总统府交涉。李大钊当时还要筹备并出席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年会。

陈独秀、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，深层原因是对于中共一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。中共一大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，但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前，当时闹革命的共产党员和一大出席者并没有这样的认识。下面我们看一看一位当事者的回忆。

参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：

“1921年夏天，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，由邓中夏教国文，张国焘教数理，我（指刘仁静）教英文。有一天，我们接到上海通知，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，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。”“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，但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，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。”“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：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。在选第二个代表时，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，然而他们十分谦让，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，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。”^①

当年的共产党员并没有特别在意一大的重大意义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奇怪。当年最初闹革命的一批共产党人，在开会时，并没有严格的会议程序和规格，



陈独秀(1879—1942)



李大钊(1889—192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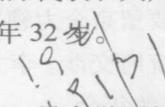
^①李颖编：《从一大到十七大》（上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9页。

往往重视内容而不大注重形式，更没有把参加某个会议作为身份地位高低的象征，只是把出席政治会议当成是工作需要，而不是当成荣耀与资本。由此，就可以理解陈独秀、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了。

二、英气勃勃的中共一大代表

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计有 15 人，其中共产国际代表 2 人，中国共产党代表 13 人。2 名共产国际代表，一个是马林，另一个是尼克尔斯基。

共产国际代表马林，1883 年出生于荷兰，17 岁走上革命之路，19 岁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（即共产党），1913 年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，并参加当地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活动。1918 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，返回荷兰。1920 年 7 月以荷兰共产党代表的资格赴苏联，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，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，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。1921 年初受共产国际委托到中国。马林会说英语、德语，并略通俄语。时年 38 岁。

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，1889 年出生于俄罗斯，读了 3 年小学后先当工人，后来从军。1921 年 6 月，他以苏俄人民革命军代表、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的三重身份到中国，会俄语不懂其他外语。时年 32 岁。


参加中共一大的中国代表 13 人是：

李达（1890—1966），湖南省零陵县人，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。最高学历是就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（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），大学专业是理科。他在日本留学期间，用一年时间学会了日语，后又学会了英语和德语。他自 1918 年夏天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工作，社会职业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，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，1920 年 11 月主编《共产党》月刊。1921 年 4 月，他与读过女子师范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会悟结婚。参加一大前，党内职务是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。时年 31 岁。


李汉俊（1890—1927），湖北省潜江县人，其父是前清秀才、私塾先生。他从 14 岁就到日本学习，留学日本 14 年，通晓日、德、英、法 4 国语言。最高学历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，学的是土木建筑，但他在读大学期间，主要精力用在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，所以大学毕业时，专业成绩不佳，毕业论文只有 65 分。1918 年年末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工作，社会职业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，长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，1919 年至 1920 年间，他在《新青年》等刊物上发表了 90 多篇译文和文章。参加一大前结过婚，有个女儿。1920 年 12 月至 1921 年 2 月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。时年 31 岁。

张国焘（1897—1979），江西省萍乡县人，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，其父曾当过浙江象山县知事。最高学历是就读于北京大学。1916 年秋，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，当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、本科三年制。他在预科读了三年后，1919 年转入本科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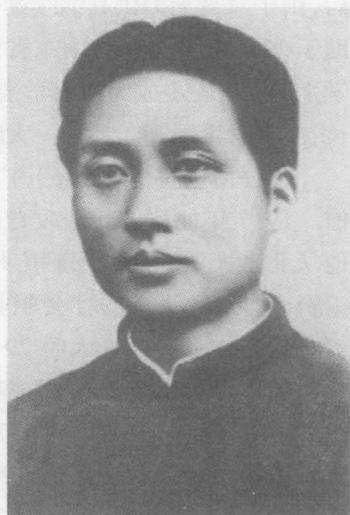
习。理科成绩好，通晓英语。他不擅长写理论文章，但能言善辩，喜欢抛头露面，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曾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，被邓中夏等同学称为“学生要人”。参加一大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时年24岁。

刘仁静（1902—1987），湖北省应城县人，其父是秀才、私塾先生。最高学历是就读于北京大学。他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，开始读的是理科物理系，由于数学不好，后转入外语系学习，在一大召开期间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。后来因为忙于革命而耽误了毕业考试，没有获得北大的学历。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，年轻勇敢，曾与几个同学从窗户翻进卖国贼曹汝霖家打开大门，并痛打章宗祥，因此被捕入狱一个多月。与张国焘、邓中夏一起，被人誉为“北大三杰”。他小时由父母做主定过娃娃亲，但当时尚没结婚。参加一大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年仅19岁，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。

董必武（1886—1975），湖北省黄安县（今红安县）人，其父是一个清贫的私塾先生。他18岁时考中秀才，1910年24岁时结婚。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同盟会，曾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秘书、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科长。曾到日本留学，最高学历就读东京私立日本大学，学习法律。在日本期间，参加了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。1915年奉孙中山之命回湖北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斗争，曾两次被捕入狱。1917年2月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。董必武教过小学，当过中学英语老师，开办过律师事务所。1920年在武汉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，教国文。参加一大前的社会职业是教师，时年35岁。

陈潭秋（1896—1943），湖北省黄冈县（今黄冈市黄州区）人，出生于一个教书兼种田的书香之家。祖父中过举人，到父辈时家道中落，但经济上尚能供他上学。他于1919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。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酷爱文学，精英语，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。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，他是武汉地区的学 生运动领袖之一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曾担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，参与创办了《新教育》、《武汉星期评论》等刊物，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担任英语教员。弱冠之年与同乡林氏结婚。参加一大前的社会职业是教师，时年25岁。

毛泽东（1893—1976），湖南省湘潭县人，出生于一个富裕中农家庭，父亲有水田22亩，兼经商。先是读过6年私塾，后来在长沙前后上过几年学，最高学历是中等师范。1918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曾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过半年的管理员，旁听过北京大学的部分课程。1918年4



毛泽东（1893—1976）

月，与蔡和森、何叔衡等组建新民学会。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，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，并创办了著名的《湘江评论》，在该刊发表了20多篇文章。1920年冬与杨开慧结婚。参加一大前的社会职业是教师，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，当时的党内职务是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。时年28岁，是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的平均年龄。

何叔衡(1876—1935)，湖南省宁乡县人，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。早先读过8年私塾，26岁时考中秀才。后来的最高学历是就读中等师范。1913年37岁那年，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，一年后并入省立第一师范，结识了比他年轻17岁的毛泽东，并成为挚友，与毛泽东一起组建新民学会，并曾任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。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“叔翁办事，可当大局”。曾担任过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，主办《湖南通俗报》。参加一大前，他的社会职业是中学教师，出席一大时45岁，已是三个女儿的父亲，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。

王尽美(1898—1925)，山东省莒县人，出生于一个佃农之家。他的最高学历是中等师范。他高小毕业后，曾因家贫失学务农两年多。1918年，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其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，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。1920年3月，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王尽美被吸收为该会在山东最早的通讯员。1920年11月，他以研究新文化思潮为号召，联络邓恩铭等进步学生，成立“励新学会”，创办《励新》半月刊，担任编辑主任。参加一大前的社会身份是学生，在党内的身份是济南党组织负责人。参加一大时23岁，已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。

邓恩铭(1901—1931)，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水族。小学毕业后，由于家贫无力供其继续读书，他便到山东投奔经济条件尚好的二叔，并由二叔资助于1918年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。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，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逐步成为济南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，曾任所在中学学生自治会的出版部长，主编学生周刊。参加一大时20岁，是个高中学生，是一大代表中学历最低的。

陈公博(1892—1946)，广东省南海县人，其父曾担任过广西提督，是一个大官僚。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，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。1920年夏，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，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想为宗旨的《广东群报》，并任总编辑。参加一大前的社会职业是广东法政学校教授，在广州党组织内的职务，是负责宣传工作。参加一大时29岁，新婚不久。

周佛海(1897—1948)，湖南省沅陵县人，其父曾任过县知事，但周佛海出生不久父亲病逝，家道衰落。1917年，他中学还没毕业，就由所在中学校长和好友资助到日本留学，最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。五四运动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，编译发表过一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。1920年暑假，离别故土3年的周佛海决定回老家省亲，在途经上海期间，参加了上海党组织，然后继续到日

本留学。他是以中国旅日学生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一大的。周佛海在一大召开前的社会身份是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，参加一大时已婚，并有儿女，时年 24 岁。

包惠僧(1895—1979)，湖北省黄冈县(今团风县)人，其父做过几天候补巡政司这样的九品小官，后来回乡务农，家庭出身算是小土地经营者。最高学历是中等师范。他于 1912 年至 1917 年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。读师范期间结婚。毕业后，在两所学校教书近一年，后在武汉任《汉口新闻报》、《大汉报》、《公论日报》、《中西日报》等报记者。1919 年春到北京，曾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半年。1920 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，任书记。1921 年 1 月，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到达上海，准备经上海到苏俄留学，但因故没能成行，于是就留在上海参加党的工作。1921 年 5 月，为了请在广州工作的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，包惠僧到达广州，但陈独秀表示不能马上回去，包惠僧就留在广州，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，做《广东群报》的编辑。

陈独秀自己不能参加一大，就指定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一大。这就导致了后来党的一大代表到底是 12 名还是 13 名的争论，争论的核心，就是包惠僧是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。当时，湖北党组织已有 2 名代表与会，包惠僧不是湖北党组织派出的代表，这是明确的。包惠僧在参加一大前在广州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，也不是作为广州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一大。

这就提出一个问题，陈独秀个人指定参加一大的包惠僧是不是正式代表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都没有把他算成是一大正式代表。改革开放后编写的党史正本，已承认包惠僧是一大的正式代表。因为党在初创时期，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，加上缺乏经验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，因此，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。据当事人的回忆，多数参加一大的代表并没有经过选举，有的地区的代表是领导人指定的，有的地区的代表是协商产生的，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审查。包惠僧也不是列席代表，因为包惠僧不仅参加了整个会议，而且享受与其他代表一样的权利。

从上述 13 名中国代表的基本情况中，可以看出许多重要的信息。

从 13 名代表的性别来看，全部是男性，没有一位女性。

从 13 名代表的年龄来看，平均年龄接近 28 岁，正是风华正茂、朝气蓬勃的年岁。

从 13 名代表的民族来看，12 人是汉族，只有邓恩铭 1 人是少数民族——水族。

从 13 名代表的社会成分来看，全部都是知识分子。

从 13 名代表的社会职业来看，教师 5 名：董必武、陈潭秋、毛泽东、何叔衡、陈公博；在读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5 名：张国焘、刘仁静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周佛海；编辑 3 名：李达、李汉俊、包惠僧。

从 13 名代表的学历来看，有大学学历或读过大学的 8 人，省立师范毕业或就读的 4 人，在读的省立一中的中学生 1 人。另外，董必武、何叔衡两位年长的代表

还考中过秀才。

从 13 名代表的留学经历来看,其中有 4 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,他们是李达、李汉俊、董必武、周佛海。

从 13 名代表的外语水平来看,4 名在日本留过学的都会日语,英语比较好的有 7 位:李达、李汉俊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陈公博。在英语比较好的 7 人中,刘仁静、陈潭秋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。

从 13 名代表的家庭出身来看,没有一个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,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 11 位,占绝大多数,只有张国焘、陈公博 2 人是官宦地主家庭出身。

从 13 名代表的社会兴趣来看,他们当时都热心国家的救亡图存活动,有的参加过辛亥革命,多数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。

从 13 名代表的特长来看,都是爱读书、爱思考的知识分子,绝大多数都写得一手好文章,要么是自己办报,要么是向报刊投稿,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

从 13 名代表的籍贯来看,湖北籍的党代表 5 人:李汉俊、刘仁静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包惠僧;湖南籍的党代表 4 人:李达、毛泽东、何叔衡、周佛海;另外,江西、山东、贵州、广东籍的代表各 1 人。

从 13 名代表与北京大学的关系来看,有 5 人与北京大学关系密切,其中毕业或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有 3 人:陈公博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。另外,毛泽东在北大工作并旁听过半年,包惠生也在北大短期学习过。

从 13 名代表的婚姻状况来看,其中 10 人已婚,只有 3 名比较年轻的代表张国焘、刘仁静、邓恩铭没有结婚,但刘仁静小时候就定了娃娃亲。

正是上述 13 名中国代表,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帮助下,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,从此在中国掀起了风云激荡的共产主义运动。

三、在秘密状态下紧张召开的中共一大

秘密召开的中共一大,它的最重要的使命,就是创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——中国共产党。

围坐在餐桌边的 15 个人,为什么会想到要悄悄地在中国组建共产党?

要革命,就要有革命的发动机和指导者。政党正是革命的最好的发动机和指导者。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,给了在黑暗中追求真理的中国人以新的希望,一些渴望中国独立和进步的知识分子,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,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,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共产党组织。

1920 年 2 月,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、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为了免受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,悄悄从北京迁居上海,北京大学另一著名教授、中国最早系统宣传马克



中共一大会址

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到天津的路途中，两人就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，并组织共产党。

1920年8月，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在湖南的好友毛泽东写信，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，因为党是“革命运动的发动者、宣传者、先锋队、作战部”。1921年1月，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表示“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，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”，并说“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”。

中国在酝酿建立共产党的过程中，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。十月革命胜利后，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国共产党人的活动，在列宁的提议下，1919年3月，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，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联合组织。

1920年4月，经共产国际批准，俄共(布)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，意在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。维经斯基等人到达北京后，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，首先结识李大钊，李大钊又把他们推荐到上海和陈独秀见面、交流。维经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，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。

1920年8月，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等人在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党的早期组织，陈独秀任书记。同年10月，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党的早期组织。此后，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推动下，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，湖北武汉、湖南长沙、山东济南和广东广州，也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。在国外两个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和法国留学生中，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。

到中共一大召开前，早期党的组织达到了8个，党员共有50多人。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，绝大部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，只有个别人是工人。

在中共一大召开前，各个地方的党的早期组织之间只有个别的松散的联系，相

互之间是平行的关系，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，没有统一的纲领和章程，也没有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。为了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党组织，就需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，宣告统一的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成立。

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，就需要其中的一个党的早期组织发挥大会的组织者和筹备者的作用。由于各种机缘巧合，上海党组织在不自觉中，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组即临时中央的作用。当时，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多、工业最发达的地区，上海党组织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，上海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创立的，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到达上海，认可上海党组织的实际领导地位。此外，上海有十里洋场，外国人比较多，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出行相对不那么引人注意，更安全些。

1921年1月，在中国成立了许多早期共产党组织后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。1921年6月初，共产国际新任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。这时，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，已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到达广州，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。

陈独秀离开上海后，仍然大权在握，没有辞去上海党组织书记的职务，只是委托李汉俊代理书记。1921年2月，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章程，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。李汉俊看了这份由广州寄来的党章，十分不满，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，于是，自己重新起草了一份党章，主张地方分权。陈独秀看到后，大发雷霆。两人的关系由此恶化，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职务，由李达代理书记。这样，从1921年2月起，由李达代理书记，但李汉俊仍然协助李达做上海党组织的领导工作。

共产国际代表在与李达、李汉俊交流后，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，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。李达、李汉俊在与广州的陈独秀、北京的李大钊协商后，决定1921年夏天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决定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和时间后，李达、李汉俊还要做好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。对会议的地点选择，安全最重要。为了会议的安全，李汉俊提议到他哥哥的住处召开中共一大。

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是辛亥革命的元老。李书城16岁时考中秀才，20岁时赴日本留学，23岁时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李书城来到武汉参加武昌起义，由黄兴提议他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，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、护法等战争。李书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现上海市兴业路76号）租了一幢两层的楼房作为寓所，外人习惯称之为李公馆。中共一大召开前夕，李书城带着警卫到外地出差，没住在李公馆。

由于在租界召开会议更为安全，中共一大的开幕式就选择在李公馆召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李书城对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共一大召开作出的